

民國初期「小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流轉與鑒藏

—以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和〈南湖東游日記〉為中心

邱 吉

The Circulation and Collection of “Little Myriad Willow Hall” in Jap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cusing on Lian Quan’s Letters to Naitō Konan and *Nanhu’s East Travel Journal*

QIU Ji

Lian Quan (1868-1931) was a poet, collector, publisher, and pro-Republican intellectual who led a colorful life. His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was not only large in quantity, variety, but also high in quality. It was known as the “Little Myriad Willow Hall” colle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an Quan’s Letters to Naitō Konan and *Nanhu’s East Travel Journal*, and analyzes Lian Quan’s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his activities in Japan and his interaction with The Japanese art circle. Thus, the mystery of the circulation and collection of “Little Myriad Willow Hall” in Jap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revealed.

キーワード：廉泉 (Lian Quan)、内藤湖南 (Naitō Konan)、小萬柳堂收藏 (Little Myriad Willow Hall Collection)、民國初期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日中文化交流圈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Circle)

前言

中國近代大量文物流往海外的趨勢，始自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事件。義和團事件和辛亥革命之後，伴隨著王朝帝制的動搖和崩潰，在政情不安和軍閥混戰，以及清廢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等背景下，除清宮內府、恭王府等皇家收藏之外，以貴族、官宦和富商為代表的民間私藏亦開始以較大規模地流出海外¹⁾。文物流出海外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種²⁾：(1) 以戰時外國軍隊的文物掠奪為代表的流出方式；(2) 以三菱財閥代表購買甬宋樓藏書，以古董商山中商會、東京繭山龍泉堂、大阪博文堂、收藏家弗利爾 (Freer)、大維德爵士 (Percival David)、福開森 (Ferguson)、山本悌二郎、阿部房次郎等前往中國購買文物為代表的流出方式；(3) 以羅振玉、金興祥³⁾、廉泉等攜帶藏品東渡日本為代表的流出方式。從以上可知，文物的流向除了歐美之外，另一個重鎮就是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內在危機和種種弊病，使有識之士對歷史前景感到憂慮和茫然⁴⁾。在此種背景之下，一股回歸和復興東方文化的風潮油然而生。隨著中國主流美術品的海外流出，歐美和日本對中國文物展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尤其是中日之間不僅有著「一衣帶水」的距離優勢，而且由於海上航運事業的發展，上海作為重要的文物匯聚都會和國際貿易港口，成為文物輸出日本的中心，而東京和大阪則成為中國文物輸入日本的兩大中心，三個城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橢圓形文化交流圈⁵⁾。在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等學者的指導之下，日本形成了以正統中國書畫藏品為主的關西書畫收藏圈⁶⁾。201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探討近代關西中國書畫藏品

1) 富田昇著、趙秀敏譯，《近代日本の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鑑賞》(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270。

2) 參見佐佐木剛三，〈清朝秘宝の日本流転〉，《芸術新潮》16(9)，1965年9月，頁132-140；富田昇，《流転清朝秘宝》(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2)；鶴田武良，〈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國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中國明清名畫展》(東京：日中友好會館，1992)；Lara Jaishree Netting, *A Perpetual Fire: John C. Ferguson 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Zaixin Hong, "Moving onto a World Stage: The Modern Chinese Practice of Art Collecting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Japanese Art Market."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115-130.

3) 金興祥 (1878-1941)，名頌清，浙江秀水 (今嘉興) 人。金氏是在中日之間從事物買賣的古董商，1920年代在上海開辦中國書店，1936年曾在東京開辦古董展覽，現今東京國立博物館和三井紀念美術館收藏的不少書畫精品均是所謂「金氏攜來品」或「金頌清氏將來品」。參見陶德民，〈關於內藤文庫所藏鈔本《章氏遺書》來歷之考證〉，《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0號，2017年3月，頁413-414；富田淳，〈槐安居コレクションと永閣コレクション〉，《關西中國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關西中國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2012年3月，頁59-63。

4) 斯賓格勒 (Spengler) 著、齊世榮譯，《西方的沒落》(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5) Tamaki Maeda, "(Re-) Canonizing Literati Pain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Kyoto Circle."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215-227. Kuiyi Shen, "The Shanghai-Japan Connec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世變形象流風：中國近代繪畫1796-1949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2008)，頁233-258。

6) 關於「關西書畫圈」的收藏動向，詳見田中日佐夫，《美術品移動史：近代日本のコレクターたち》(東京：

形成的意義，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觀峰館、京都國立博物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泉屋博古館、澄懷堂美術館、藤井齊成會有鄰館、大和文華館等九館聯合舉辦了名為「關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収集から一世紀・その意義を考える」的盛大國際研討會。2018年，大阪市立美術館為紀念阿部房次郎誕辰150週年，舉辦了特展「阿部房次郎と中國書畫」，共展出約80件作品，其中倪瓚「溪亭秋色圖」、石濤「東坡時序詩意圖冊」、惲壽平「花卉冊」、高鳳翰「指畫冊」共4件為收藏家廉泉的舊藏。

廉泉是清末民初極具傳奇色彩的一位人物，他精詩文，善書法，嗜金石書畫，他的書畫收藏不僅數量大、品種多而且質量高，以「小萬柳堂」藏品著稱。1914年日本召開東京大正博覽會，廉泉以民間學者身份攜珍藏的書畫東渡日本，期間流入日本的「小萬柳堂」藏品在書畫鑒藏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辛亥革命之後，私人珍藏的中國書畫流入日本的典型實例之一，他的藏品被近藤廉平、山本梯二郎、阿部房次郎等財經界的名流購買和收藏，對促進近代日本中國書畫藏品規模的形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可以確認的是，東京國立博物館（844件）、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1件）、大阪市立美術館（5件）、關西大學內藤文庫（2件）均收藏有廉泉的舊藏書畫。然而遺憾的是，以往學界對廉泉的關注度並不高，其相關的先行研究亦不多且間有訛誤⁷⁾。近年來雖然廉泉的史料研究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⁸⁾，但是其書畫收藏在日本的流轉與鑒藏仍然有待深入考察研究。

廉泉一生共六次（1914、1915、1916、1917、1919、1927）東渡扶桑，期間參加東京大正博覽會，在東京美術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舉辦小萬柳堂鑒藏書畫展覽會，在神戶椰取山建造「三十六峰草堂」並設立「南湖扇面美術館」，出版和介紹中國書畫。訪日期間，廉泉與漢學家三島中洲（1831-1919）、美術史家大村西崖（1868-1927）、東洋史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等日本文化界的名流切磋詩文、品賞金石書畫。經筆者調查，內藤文庫藏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26封，其中書信10封，明信片16枚。本文以未刊書簡和〈南湖東遊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等一次史料為中心，探討民國初期收藏家廉泉的「小萬柳堂」收藏及其與內藤湖南的交友情況，進而揭開「小

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陶德民編著，《內藤湖南と清人書畫：関西大學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藏品集》（關西大學出版部，2009）；關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研究編、曾布川寛監修，《中國書畫探訪：関西の收藏家とその名品》（東京：二玄社，2011）。

7) 例如鈴木洋保認為廉泉四次訪日並與日本的春野女士育有一子（次男翼成），實際上廉泉曾六次訪日與春野女士育有三子（次男翼成、三男弼成、四男展成）。參見鈴木洋保，〈廉泉の来日：三島中洲との交流〉，《國語年誌》第14號，1995年11月；鈴木洋保，〈廉泉の日本における活動〉，《書学書道史研究》1996卷第6號，1996年9月，頁71-86；戰曉梅，〈廉泉と大村西崖の交友〉，《美術研究》425號，2018年7月，頁35-54。

8) 關於廉泉的史料研究主要有王宏，〈廉泉年譜初稿〉，《近代中國》（第二十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頁388-433；鄧昉，〈廉泉致盛宣懷手札〉，《歷史文獻》，2017年，頁280-298；廉泉著、廉仲整理，〈南湖東遊日記〉，《歷史文獻》，2017年，頁98-159；戰曉梅，〈大村西崖宛 廉泉書簡 翻刻〉，《美術研究》四二五號，2018年7月，頁55-112；郭建鵬、姜紹澤，〈廉泉書札拾遺〉，《近代中國》，2019年第1期，頁313-335。

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流轉與鑒藏之謎。

一 廉泉及其「小萬柳堂」收藏

廉泉（1868-1931）（圖1），字惠卿，號南湖，又號小萬柳堂居士、扁笑、岫雲、世外人，人稱「廉夕陽」。江蘇無錫人，以先賢廉潔為始祖，元右丞廉希憲為二世祖，是清末民初我國著名的收藏家、教育家、出版家、詩人，著有詩集《南湖東游草》《潭柘記游詩》《南湖集》等。1886年與安徽桐城派後期作家吳汝綸姪女吳芝瑛（1868-1934）⁹⁾成婚。1894年中舉人，1895年在京會試時參與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等人發起的「公車上書」。他曾擔任京師農工商局總辦，官至度支部郎中，與清末大收藏家端方（1861-1911）、實業家盛宣懷（1844-1916）等頗有交誼。1902年與俞復（1856-1943）、丁寶書（1866-1936）等人創辦文明書局，引進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印刷技術編印教科書和出版中國書畫。1904年，廉泉因不滿清廷統治，辭官南歸，移家上海，在上海曹家渡建造別墅「小萬柳堂」；1908年，又在杭州西子湖畔蘇堤附近建立另一別墅「小萬柳堂」。廉泉吳芝瑛夫婦將畢生收藏的書畫藏於上海和杭州的別墅，這批藏品就是著名的「小萬柳堂」書畫。



圖1 廉泉 內藤文庫藏



圖2 《名人書畫扇集》私人藏 孔夫子舊書網

「小萬柳堂」書畫中，最著名的當屬明清兩代書畫名家的扇面，這批書畫扇面原本是廉泉在江

9) 吳芝瑛（1868-1934），字紫瑛，號萬柳夫人，安徽桐城人，出生於官宦之家，其父吳康之（字寶三）歷任寧陽、禹城、蒲台等地的知縣。自幼聰慧，習文史，喜書法，初學董其昌，中年臨崔敬昌墓誌，有《小萬柳堂法帖》傳世。清末民初著名的書法家、教育家、慈善家，與著名女革命家秋瑾有金蘭之誼。

蘇泰州的親戚宮本昂、宮昱的舊藏。宮本昂（1821-1874），字子行、紫珩，號千里，室名廷蝶仙館，其弟宮昱，字玉甫，工詩畫，著有《念雨草堂集》。宮氏兄弟精鑒賞，為同治光緒年間著名的收藏家，是明末名士宮偉鏐（1621-1680）的後裔，收藏了明清書畫家800餘人的扇面作品，共計1053幅，編為《書畫扇存》六集。上自明「吳門四家」、董其昌、王建章、謝時臣、陳洪綬、陳繼儒，下迄清「四王吳惲」、「清四僧」、「揚州八怪」、毛奇齡、沈銓、龔賢等，幾乎囊括了明清所有的書畫名家。關於這批書畫扇面的遞藏經過，端方在《廉氏小萬柳堂藏畫記》中寫道：「（前略）宮先生病革時，遺囑將扇冊歸廉氏，語其妻孫夫人婉如曰：余自弱冠無所好，惟古書畫是娛。每遇名賢真蹟，趣賞翫徘徊不能去。吾弟玉甫，亦愛慕之。五十年來，兩人宦游所歷，併力搜羅，哀然遂成此集。蓋吾兄弟精神所寄，悉在於是。我死，為我致扇面於廉氏，藏之小萬柳堂，庶不負我兄弟畢生搜集之苦心耳。」¹⁰⁾ 1911年，廉泉將名家扇面編成《小萬柳堂明清兩朝書畫扇存目錄》出版，端方為其作序，盛讚其收藏為「宇宙之奇觀」。1915年，上海文明書局使用珂羅版印刷技術出版《名人書畫扇集》（圖2）共60冊，其中畫集40冊，書集20冊，每冊售價大洋一元，銷量極好，1917年9月再版印刷。該畫集以「小萬柳堂」收藏的明清扇面為原本，收錄了著名畫家、文人的山水、花鳥、人物及書法扇面作品共600幅，對鑒賞明清名家書畫真蹟、研究國畫技法與畫風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14年3月20日至7月31日，為慶祝大正天皇登基以及謀求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日本舉辦東京大正博覽會。據〈日記〉記載，廉泉在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1866-1914）的邀請下，以民間學者的身份，攜「小萬柳堂」收藏首次東渡日本參加博覽會¹¹⁾。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1862-1940）在給《小萬柳堂劇蹟》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今茲甲寅，我邦開大正賽會於東京。君乃乘槎來觀，篋藏古今劇蹟數十百幅，而相從，余諗聞小萬柳堂之名久已。」¹²⁾ 廉泉自1914年3月31日乘坐「近江丸」從上海出發，途經長崎、神戶、橫濱，於4月5日抵達東京。抵達東京後，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1867-1939）與廉泉商量，決定於4月16日在東京帝國大學舉辦簡單的書畫展覽，擬將展出《楞嚴經》墨跡及唐宋名畫等作品。廉泉在〈日記〉中寫道：「上午七點三十分，用小車送書畫箱至東京帝國大學。瀧精一與服部（服部宇之吉）及文學博士松本亦太郎逐件展覽，筆之於冊。大學教授七八人同觀。」¹³⁾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向日本學習振興實業的方法和提高國貨聲譽，中華民國政府也派員參加了此次博覽會。雖然廉泉以個人身份參加博覽會，但是受到了主辦方相當高規格的對待，他的藏品被安排在了日華貿易館的貴賓室陳列。展出了王建

10) 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編，《校友會月報》第13卷第3號（1914年7月），頁42。

11)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98。

12) 東京美術學校編纂，《小萬柳堂劇蹟》（東京：審美書院，1914），序言。

13)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108。

章金箋《山水圖》(大幅)及其扇面作品、鄧石如書聯、吳芝瑛小楷《楞嚴經》十卷、《妙法蓮華經》一冊、《澄清堂題跋》一冊等作品,引來無數名流前來觀展,《時事新報社》、《東京日日新聞》、《讀賣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十餘家媒體報刊記者趕往採訪與報道展會的盛況。



圖3 吳芝瑛《臨董其昌字卷》(局部) 60×26cm 內藤文庫藏

此外,應正木直彥和大村西崖的邀請,1914年6月6日至6月7日,廉泉在東京美術學校圖書館舉辦了「小萬柳堂鑒藏書畫展覽會」。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報道了此次展會的盛況,大約有1500人前來參觀,來賓有政治家犬養毅、男爵九鬼龍一、細川潤次郎、牧野伸顯、近藤廉平、東京帝室博物館館長股野琢、實業家山本悌二郎、作家矢野龍溪、畫家下條正雄等各界名流。根據《小萬柳堂書畫展觀總目錄》,此次展會展出了韓幹《滾沙馬卷》、南唐拓本《澄清堂帖》、郭熙《雪溪晚圖軸》、王蒙《山水卷》、董其昌《蘭亭記字屏》、石濤《東坡時序詩意圖冊》、王建章《廬山觀瀑圖》、惲南田《花卉冊》、吳芝瑛《臨董其昌字卷》(圖3)等自唐代至民國的68件作品¹⁴⁾。然而有趣的是,68件作品中有四件為吳芝瑛的作品,筆者調查發現,其中《臨董其昌字卷》現藏於內藤文庫,是其臨摹董其昌的經典之作。吳芝瑛出身名門,自幼博覽群書,有「詩、書、文」三絕之譽。在書法上,她的楷書取法歐陽詢、褚遂良,從歐書中得筆力,褚書中取伸展,保存了濃郁的唐人特色,用筆瀟灑飄逸,中宮收緊,筆畫舒展;她的行書取法「二王」和董其昌,後來涉獵北魏崔敬邕墓誌,書風變得勁挺瘦勁,結字給人舒朗絢麗之感,時人譽之為「瘦金體」¹⁵⁾。從該字卷的書跡可以看出,吳芝瑛在臨董書中很注重韻度筆力,在形態與神態上,拿捏恰到好處,董其昌韻味十足。字卷長60公分,寬26公分,內有廉·吳夫婦所用鈐印17處(圖4-1~圖4-17),其中朱文方印9處,白文方印8處,各處鈐印內容如下:

14) 前掲,《校友會月報》,頁41-45。

15) 鄒典飛,〈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吳芝瑛〉,《藝術品》,2017年第7期,頁35-36。



圖 4-1 寫經室



圖 4-2 墨林星鳳



圖 4-3 唐經閣



圖 4-4 小萬柳堂



圖 4-5 寫經室



圖 4-6 悲秋閣



圖 4-7 家住蘇堤第一橋



圖 4-8 塔影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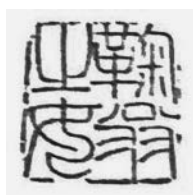


圖 4-9 鞠翁之女



圖 4-10 吳芝瑛印



圖 4-11 家住南湖因以自號



圖 4-12 小萬柳堂



圖 4-13 宮子行同弟玉甫寶之



圖 4-14 紫英所書



圖 4-15 紫英女史



圖 4-16 夕照亭



圖 4-17 桐城吳芝瑛印

以上十七枚鈐印中，圖4-2「墨林星鳳」出現於《南唐真本澄清堂帖》吳芝瑛的題跋：「古封泥，猶今之紅，所謂紫泥封詔是也。冰鐵先生做製此印，為南湖得澄清堂之紀念。且曰萬柳夫人所書十三跋，亦當代之墨林星鳳也。自今以往，夫人書，請鈐此印，可無媿也。（中略）辛亥、秋分後一日、芝英題於唐經閣。」¹⁶從跋文中可見，此印為篆刻家王大炘（號冰鐵，？-1925）仿古封泥風格所製之印，為紀念廉泉獲得澄清堂法帖，王大炘將此印贈予吳芝瑛。王與廉·吳夫婦交好，用印多數為王大炘所製。據鈴木洋保氏統計¹⁷，王大炘印譜《王冰鐵印存》中，收錄廉氏夫婦用印多達44枚。其中圖4-3「唐經閣」亦出自王冰鐵之手，廉泉因收藏了唐代寫本《妙法蓮華經》一冊，王為其製「唐經閣」收藏印。圖4-13「宮子行同弟玉甫寶之」為宮氏兄弟的鑒藏印，多用於其鑒賞過的書畫扇面的作品之中。吳芝瑛將此印用於自己的臨摹作品，可見廉吳夫婦不僅繼承了宮氏兄弟的書畫，而且連其鑒藏印也收入了囊中。圖4-6「悲秋閣」出現於《南湖詩意》吳芝瑛的題詩：「戊申花朝，西泠，弔鑑湖女俠，四首（其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築悲秋閣，風雨英靈償一還。（余今在南湖之濱，結茅數椽中，建一閣，名曰悲秋，以為紀年。」¹⁸吳芝瑛為悼念1907年7月英勇就義的金蘭之交秋瑾（號鑑湖女俠，1877-1907），義葬其於杭州西泠湖畔，並在杭州「小萬柳堂」別墅內建造「悲秋閣」，以志哀悼。此後，常用鈐印「悲秋閣」，以紀念為革命犧牲的友人。

在廉泉致內藤湖南的書簡中，廉泉多次提及上述吳芝瑛《臨董其昌字卷》，此外還將其在博覽會和「小萬柳堂鑒藏書畫展覽會」上展出，由此可見廉氏應該相當喜歡這幅作品。然而，就目前此幅作品藏於內藤文庫來看，廉氏可能將其贈送或者出售給了內藤。那麼，內藤與廉泉有著怎樣的交友關係呢？下一節將試圖考察二人的交友情況。

二 廉泉與內藤湖南的交友

廉泉與內藤的交流究竟經由誰的介紹、從何時何地開始，尚且不明。據〈日記〉記載，二人在日本初次見面於東京「日昇館」，時間為1914年7月5日¹⁹。筆者對廉泉致內藤的26封書簡做了解讀和梳理，時間最早的一封信亦為「甲寅七月五日」（1914年7月5日），內容如下：

陰閏生公使贈以姚元之²⁰所畫南《萬柳堂圖》，以詩為謝四首。

16) 廉泉編，《南唐真本澄清堂帖》（神戶：扇面館，1915年）。

17) 鈴木洋保，〈小萬柳堂と澄清堂法帖〉，《書論》，1999年1999卷9號，頁49。

18) (清)吳觀岱畫、吳芝瑛書，《南湖詩意》（上海：文明書局，1911），頁17。

19)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147。

20) 姚元之（1773-1852）清代官員、書畫家。字伯昂，號薦青，又號竹葉亭生，晚號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年進士，官至左都禦史、內閣學士。善畫人物、果品、花卉，書法尤精隸書。姚元之與崔旭、梅成棟皆出自清代著名詩人張問陶門下，合稱「張門三才子」。

經年塵土滿衣巾，舊院鍾聲入夢頻。回首城南天一角，楊花飛作兩家春。(湯雨生²¹⁾題指為臨松雪本《萬柳堂圖》²²⁾，誤也)。

拈花寺裏人何在，鄒伯湖面迹未磨。莫漫披圖起鄉思，大江風急客帆多。(元廉右丞萬柳堂在京師城外。本拈花寺南萬柳堂在揚州鄒伯湖邊，為阮芸台²³⁾相國之別業)。

讀畫初鶯似到家，蓮塘背郭帶平沙。遺山曲譜分明在，不見當年解語花。(萬柳堂成松雪為之圖，右丞公與松雪及靈疎齋觴詠其中，有侍兒名解語花者，歌遺山小令以侑酒)。

嚇鷗珍重遠相貽，高木猶存故國思。南北兩堂成一瞬，蘆花如雪不勝悲。

劣吟甫脫稿錄呈湖南先生明教，廉泉，甲寅七月五日。

書簡中「閩生公使」為當時的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1876-1914)，字閩生，1913年12月赴日本出任全權公使，得知廉泉來日本參加博覽會，親自到訪廉所住旅館。據〈日記〉記載：「七月三日，閩生公使來訪，留其午餐。閩生贈以姚元之所作《萬柳堂圖》直幅，並題跋曰：此幀得於宣統辛亥，小萬柳堂主人廉南湖先生來東見此，為述萬柳堂本原委，因欣然贈之。不知吳興名迹尚在人間否？請以此作延津之合，何如？甲寅七月，陸宗輿。」²⁴⁾此處「吳興名迹」是指趙孟頫筆《萬柳堂圖》(圖5)。這封書簡也是廉泉對姚元之《萬柳堂圖》中描繪的文人雅集情境，是否模仿了趙孟頫《萬柳堂圖》所繪情境所作的考證。七月三日〈日記〉如下：

(前略)圖作於道光二十年，姚氏題款曰：「草堂中向西坐者為北渚老人，壽八十一。向東坐者為芸台相國，壽七十七。前有石鼓者，為萬柳堂。堂西高阜處，為黃小松。隅荷池上為三十六陂。亭右有遠帆處，為露筋祠。有樓處，為邵伯埭。埭西為冶平寺。」是此圖為阮文達之南萬柳堂也！湯雨生將軍題三絕句其上……又題曰：「萬柳堂為馮相國別業，蓮塘花嶼為鴻博者雅集之所，今則衰柳數行，葦花如雪而已。壬寅中秋日，與千波大兄宴集聽月樓，出伯昂臨松雪本，因錄舊作三首。湯貽汾雨生甫。」余謂錄舊作可也，指為臨松雪本則誤矣。松雪所圖，是京師城外之萬柳堂，為吾家右丞公別墅。²⁵⁾

21) 湯雨生，即湯貽汾(1778-1853)，字若儀，號雨生，晚號粥翁，江蘇武進人。曾官至溫州鎮副總兵，其人多才多藝，於百家之學均有所造詣，工詩文書畫，精於山水，亦能花卉松柏。

22) 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為宋之宗室。善畫山水、木石、花竹、尤精人馬。《萬柳堂圖》所繪意境為叢柳茂盛的池塘邊，有位文士騎馬來訪，庭院內三位文士已聚萬柳堂中，即將興起文會的高潮。全幅不論楊柳、人物、房舍都以極細膩的筆法描繪，精致清雅。

23) 阮芸台，即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謚號「文達」，江蘇儀征人。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太傅。

24)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146。

25)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146-147。



圖5 (元)趙孟頫《萬柳堂圖》
紙本設色 95.1×26.1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從日記中可知，廉泉認為姚元之所繪文人雅集的情境為「阮文達」的揚州「萬柳堂」，而清代溫州鎮副總兵湯雨生所題：「萬柳堂為馮相國別業，出伯昂（姚元之字）臨松雪本」則有誤。廉泉以四首詩附帶解說的形式對這個問題作了考證，即「南萬柳堂在揚州鄒伯湖邊，為阮芸台相國之別業」，阮芸台為清道光年間大學士阮元（1764-1849），謚號「文達」。書簡落款時間為甲寅（1914）七月五日，而正好七月五日廉泉「訪內藤博士於日昇館，遇野口席上，遂同至本鄉區湯島孔子祭典會。」²⁶⁾這也是〈日記〉中廉泉與內藤湖南初次相遇的時間。筆者推測，廉泉去拜訪內藤時，與他探討了《萬柳堂圖》所繪文人雅集情境等問題，最後廉泉「以詩為謝」並「錄呈湖南先生明教」。關於趙孟頫《萬柳堂圖》，自元代以來就有諸多版本，其所描繪的意境，時至百年後的今日，仍然是學界所關注和探討的問題。學者谷卿認為：「從繪畫風格和印鑒來看，《萬柳堂圖》並非真跡，而是後人根據元代以來諸種筆記所載萬柳堂雅集故事編繪而成。畫上有趙孟頫題詩，字非真迹，內容則系趙氏詩作，康熙間始收入趙孟頫全集，詩中既有對雅集的記錄和對主人的贊譽，也暗含趙孟頫複雜的退隱心理。」²⁷⁾

以上為廉泉與內藤在東京首次相遇及其詩文應酬的情況，在東京大正博覽會即將閉幕之際，內藤前往東京訪問廉泉。廉泉在〈日記〉中說：「七月二十七日，內藤博士來京見訪，出示宋元名蹟十數種，欣賞不置。約往西京陳列一次再返國。」²⁸⁾在內藤的邀請之下，廉泉於1914年8月3日在京都「俵屋旅館」舉辦了小型畫展。展品中除了可以確定王建章《宋元小景廿四幀》這一幅作品之外，其餘尚且不明，這幅圖為廉泉特意讓吳芝瑛從中國寄來的藏品²⁹⁾。大阪朝日新聞社對此做了「廉南湖氏歡迎」

26) 前掲，《南湖東游日記》，頁147。

27) 谷卿，《〈萬柳堂圖〉及其題詩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年第3期，頁98-110。

28) 前掲，《南湖東游日記》，頁156。

29) 廉泉在致內藤湖南書簡中說：「(前略) 硯田畫以擬《宋元小景廿四幀》為生平傑作，因有官紫玄欸，拙荊甚愛之，故未攜來。昨電屬拙荊速寄，不日可到。候滬件到，即發此頌。湖南先生安和，廉泉再拜，七月卅一日。」1914年7月31日，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

的報道：

支那の廉泉字は南湖、氏はその収蔵の法書名画数十件を携へて渡來し、久しく東京に滞在せしが、頃日歸国期迫り途次二日京都に立寄に俵屋に投宿し、東京にてもまだ未だ啓かざりし秘度二十四件把りて鑒賞に供すべく、三日午後松本亡羊、狩野君山、内藤湖南、富岡桃華、山本意山、西村天囚、磯野秋渚の諸名流れを邀へて茗香篆煙の間に之を賞玩せしめしが、多くは希世の名品にして殊に王研田（建章）の各帖卷の秀絶なる此く王画の完全は他に見るべからず、展覽数時の後諸氏は廉氏を京都ホテルへ邀へて、晚餐を共にし清談して夜半散じたりき³⁰⁾（筆者譯：廉泉字南湖，廉氏攜其收藏的數十件法書名畫前來，在東京停留數月後，歸期迫近。近日途經京都，投宿於俵屋旅館，展出了在東京未曾展出的24件精品書畫。三日下午，松本文三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岡謙三、山本竟山、西村天囚、磯野惟秋等名流彙聚一堂。展品中多數為稀世名畫，特別是王硯田（王建章）的各帖卷及其秀麗壯觀，賞玩數時後，眾人宴請廉氏於京都飯店，眾人歡洽，暢談至深夜方才散去。）

1915年6月，廉泉第二次東游日本。受内藤委託，廉泉將一部分藏品借給内藤在京都大學夏季演講會上展出。内藤在《清朝書畫譜》的自序中寫道：「大正乙卯八月、京都大學例開夏季講演會、予講清朝史通論六日、每日一題、其第六日為藝術門、乃通說清代書畫、竊謂書畫之理、直當與目謀神會、其要眇非可以空言喻也。因假貸諸友蒐羅卷軸冊頁一百數十事、以供聽講者展閱且撰目錄一通、往往評識其盛衰遞嬗之故。會畢或勸其照象編錄以為記驗、遂以刊印（後略）。」³¹⁾從序言中可以看出，内藤給學生講解清代書畫，為了避免「空言」，因此向朋友借來書畫卷軸100餘件，以此作為教材示範講解。其中，廉泉將鄧石如、王時敏、王鑑等名家的作品共計13幅借給内藤展覽示範，上述吳芝瑛《臨董其昌字卷》亦為出借作品之一，展後這100餘件清代的書畫作品被收進由博文堂出版的圖錄《清朝書畫譜》中，由此可見在内藤的中國藝術史觀念中，清朝書畫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廉泉的收藏亦成為内藤對中國書畫理解的重要來源之一。

京都大學夏季演講會展覽結束之後，廉泉將其收藏的明清名家扇面，委託日本「小林制版寫真所」使用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印刷技術，精選編輯成了畫冊《扇面大觀》，該畫冊裝禎講究，封面由吳芝瑛題眉，共兩函四冊。收錄240幅扇畫，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董其昌、王時敏、吳歷等名家精品均在其列。每冊圖前附有作者傳略，不僅極具欣賞價值和收藏價值，而且還是研究明、清兩代畫家及其扇面畫的珍貴資料。在《扇面大觀》選定製版之際，廉泉希望内藤為其審

30) 〈廉南湖氏歡迎〉，大阪朝日新聞 京都附錄（一），1914年8月5日。

31) 内藤虎次郎編，《清朝書畫譜》（大阪：博文堂合資會社，1916），序言。

校畫稿，他在致內藤的書簡（圖6）中說：

扇面大觀已選定二百四十葉，分作四集付小林制版。公諸同好寫真已訖，擬攜扇面四集奉訪。費公三十分鍾光陰審定，一過以證英雄所見之異同也。昨又疊奉端氏來書三通，敦促回國。爲了審古物歸公之事惟慮，目前國論紛紛，恐不暇談此風月。擬候扇面第一集印成，乃整歸裝。何時得暇，望示知以便趨候。興居不盡悽悽，廉泉再拜狀上。湖南先生執事。十月五日。³²⁾

在廉泉看來，一方面內藤在中國書畫領域具有很高的造詣並且具備一定的權威性，另一方面自己也想跟內藤切磋探討，以期內藤「一過以證英雄所見之異同也」。除此之外，廉泉還曾委託內藤鑑定書畫和介紹買家，他在信中（圖7）坦言：

敬啓者，昨承枉臨爲鑒定書畫，區區感謝，莫喻萬分。頃由博文堂主人托佐藤君傳謂：書畫價值太高，一時恐難得售主雲雲。此亦實情，泉亦私慮及此。泉此來之初，意只欲奉明清扇面在貴邦展覽一次，以供美術家之參考，故無求售之必要。因念及泉與芝瑛多病，在私家決難保存，芝瑛又有拾珍寶助公益之苦心（誓一物不留，一錢不入私囊，人生滄景世界空，花如是）。欲泉覺賢主人達此目的，故有將名迹留傳貴邦之意。而其價入無論多寡，全數捐與麥美德君在北京辦一女子大學，一錢不入私囊（只須捉一萬圓助無錫縣公園經費，亦芝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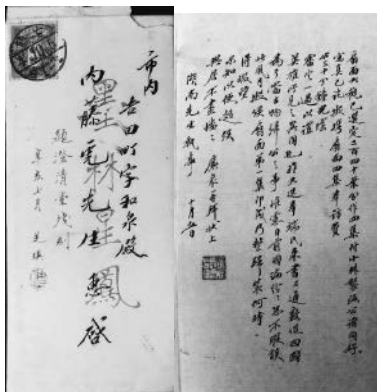


圖6 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 內藤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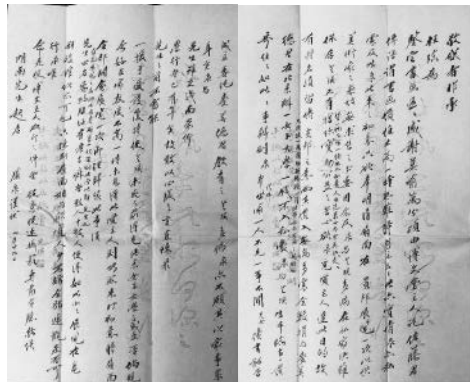


圖7 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 內藤文庫藏

32) 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1915年10月5日，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

夙願也) (後略)。³³⁾

從上述書簡中可知，廉泉第二次東游之初，原本僅是想在日本展覽明清書畫扇面，以達到美術交流之目的。然而考慮到他與吳芝瑛都體弱多病，恐怕難以將藏品永久保存，加上吳芝瑛想辦慈善教育事業以資助麥美德舉辦「女子大學」，因此希望內藤幫其尋求買主以將藏品留存於日本。信函中的麥美德 (S. Luella Miner, 1861-1935)，於1887年從美國來華傳教並從事學校教育事業，與吳芝瑛成為友人。1903年麥美德受聘為「北京貝滿女校」第三任校長，1904年創立了中國首個女子高等學校「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並出任校長。德國威廉二世 (Wilhelm II) 原本預定派威廉皇儲 (Wilhem, German Crown Prince) 於1910年訪華，清政府決定租借廉泉收藏的「小萬柳堂」書畫舉辦展覽作為歡迎儀式。然而同年發生了「鼠疫事件」，使威廉皇儲的訪華行程被迫暫停，因此廉泉的藏品亦滯留北京³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社會動亂，廉泉將藏品委托麥美德代為保管才免遭掠奪。因此，廉泉為報答麥美德的恩情，準備將出售藏品所得的大部分資金作為慈善基金捐贈給「華北協和女子大學」。

以上即為廉泉前兩次東渡與內藤的交友情況，可以說兩人的互動，不僅推動了「小萬柳堂」收藏在日本的展示與傳播，而且引領了日本民間鑑藏活動的潮流。那麼，如此龐大的「小萬柳堂」收藏，究竟有多少流入了日本呢？這些藏品現今的命運又如何呢？下文將考察廉泉的藏品在日本的複製與鑒藏情況。

三 「小萬柳堂」書畫的複製與鑒藏

關於「小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複製與傳播，實際上從廉泉首次東渡參加東京大正博覽會就已經開始了。例如1914年7月，由東京美術學校選材編纂，審美書院出版了《小萬柳堂劇蹟》，以供該校師生研究，收錄了釋巨然《山水卷》、倪瓚《秋色夕陽圖》、王鑑《擬古山水八幀》、沈周《姑蘇十景冊》、王建章《廬山觀瀑圖》等名家作品共28幅。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王建章《廬山觀瀑圖》(圖8)曾在「小萬柳堂鑒藏書畫展覽會」上展出，展後廉泉在正木直彥等人為其舉辦的歡迎會上，將此圖贈送給東京美術學校並題跋曰：

題王建章《廬山觀瀑圖》贈東京美術學校

王建章，字仲初，閩人，硯田莊居士，其別號也與泰州宮紫玄太史均明末遺老，以書畫相娛。宮氏春雨草堂記載：仲初喜畫佛像，自謂不讓李公麟山水。祖述董源筆力雄健，莫可

33) 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1915年6月29日，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

34) 前揭，《校友會月報》，頁43。



圖8 (明) 王建章《廬山觀瀑圖》
金箋水墨 279.8×109.8cm
東京藝術大學大學美術館藏

羈勒，故香山稱其墨有五采，然性廉重同志外不輕落筆，或得寸幅尺縑必相與欣賞，如獲雖彝咒敦非世間物云。蓋仲初畫在當時可貴如此，此金箋大幅《廬山觀瀑圖》係前清內府藏物，為吾高祖馭亭公所得，上方有痕處乃聖祖御璽印迹，流落人間時賈客刮去者，圖作于崇禎庚午。(中略)甲寅夏，泉來遊日本，承美術校長正木直彥君與此邦書畫名家開會歡迎，因出所藏以娛嘉賓并將仲初此圖留贈東京美術學校。用酬盛誼，備知音玩賞，俾學子藉以研磨，抑物聚散有數，東亞之實無妨普其流傳于人間世爾，承正木屬志其離合之跡如右。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八日，廉泉題記。³⁵⁾

從以上題跋中可知，明末名士宮偉鏐（字紫玄）對王建章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他認為王建章喜畫佛像，可與李公麟山水畫相媲美。此幅《廬山觀瀑圖》作於崇禎庚午年（1630），先前藏於前清內府，此圖上方原有康熙帝的玉璽鈐印，流出內府時璽印被古董商刮去，後來成為廉氏一族的收藏。為作東游之紀念以促進中日美術交流，廉泉慷慨地將此圖贈送給東京美術學校收藏至今。廉氏對繪畫藝術深有研究，尤其推崇王建章的作品。〈小萬柳堂所藏硯田畫目〉中，曾對廉泉推崇王建章書畫扇面有如下記載：

小萬柳堂主人酷愛王硯田（王建章）畫，綜先世所藏，及生平所得，成此大觀。至在南湖別墅中，築硯田莊以藏之，其欣賞可知矣。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開研究華洋物品會，中有美術一門，主人爰將硯田扇面二十四葉，陳列會場，并選錄題跋數則，冀與好古之士共賞之。³⁶⁾

廉泉東游之際，亦積極向日本藝壇宣傳王建章的書畫。在他的推介之下，東京畫報社使用珂羅版印刷技術精印了王建章所繪扇面24幅名為《王建章扇面帖》（1914）。1914年7月《書苑》第

35) 前揭，《校友會月報》，頁44。

36) 〈小萬柳堂所藏硯田畫目〉，《獨一無二之名畫出現》，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

4卷第3期刊登了王建章《雲林畫跋一則》，1914年9月至10月《美術畫報》刊登了王建章《春雨草堂圖》（第36編卷8）和《山水圖扇面》（第36編卷9）。1915年，小林寫真製版所出版了王建章《研田莊居士擬宋元小景》，此外在廉泉編輯出版的《扇面大觀》（1915）第2集中，刊登了王建章《倣李龍眠羅漢渡海圖》、《西園雅集圖》、《晴川鵝浴圖》等8幅作品。隨著廉泉在日本對王建章作品的推介與出版，王建章被塑造成了超越清初「四王吳惲」的畫家，與日本對王建章繪畫的傳統認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極大地改變了日本對王建章繪畫的傳統評價³⁷⁾。

關於「小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販賣情況，在內藤湖南致大阪博文堂老闆原田莊左衛門的書簡中有如下線索：

拜啓、昨日廉泉氏訪問攜帶の書畫並に澄清堂帖真本寫真本とも一見致候。扇面其他已
に此地にて賣却のものも有之候由なれども、殘品中にも多少珍らしき物有之。廉氏は之を
美術學校にあづけ置き、卅日出發歸郷との事。（中略）七月廿七日、虎次郎。博文堂様。³⁸⁾
（筆者譯：敬啟 昨日訪問廉泉氏，欣賞其所帶書畫及澄清堂帖真本和影印本。扇面等已在東
京出售，剩下的書畫中仍有一些精品。廉氏將其暫存東京美術學校，準備三十日出發回國。
七月二十七日，虎次郎。)

上述書簡的時間為1914年7月27日，可見廉泉在首次東渡之時就已經出售了所帶來的大部分藏品。實際上，1914年廉泉以私人身份前來參加東京大正博覽會，一方面在日本需要龐大的費用支出，另一方面1913年爆發「二次革命」，國內政局不穩加上需要資金做慈善事業，以上種種原因迫使其出售藏品以維持生計。如他在〈日記〉中曾透露：「七月二十三日，前向陸公使（陸宗輿）借日幣五百元，今又告匱，續借二百元，允到天津奉償。」³⁹⁾由此可以推斷，廉泉在日本的財政困擾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在大村西崖和正木直彥的斡旋下，廉泉將書畫扇面出售給了日清汽船社長近藤廉平（1848-1921），他在1914年7月6日致大村西崖的書簡中說道：

（前略）近藤男爵（近藤廉平）有意留吾書畫，一再敦囑，使開明價值。此事類古董商之所為，非泉所願。男爵不得已，擬請正木校長公斷價值，為兩方面信托之人，成就此事。泉已許可，惟稀世珍品，如王建章扇面、澄清堂祖帖、黃雀雲林兩卷，此等在敝國已無第二

37) 板倉聖哲，〈近世・近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國絵画鑑賞と画家像の変容：王建章の場合〉，《美術フォーラム 21》，2012年第26號，頁126-132。

38) 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頁506-507。

39) 前掲，〈南湖東游日記〉，頁154。

件，皆系無價之寶，不比尋常流行之贗本，有時價可估也。公于南畫有真識，此次展覽之事，公對於鄙人熱誠達極點，則此定價一事，尚望公與正木校長（正木直彥）協同辦理。（中略）往年麥女士（麥美德）介紹該國博物院，欲出重金收吾所有。當時鄙意只許出典，而不願絕賣，以此未能定議。今感同文之雅誼，又因欲辦公益，不得已而棄。此非授諸域外可比。（中略）廉泉再拜，大村西崖殿，甲寅七月六日。⁴⁰⁾

書簡中「近藤男爵」即為近藤廉平，1914年6月18日，近藤與廉泉相識於實業家大倉喜八郎（1837-1928）在東京墨上別墅舉辦的招待宴上。近藤作為近代日本海運界的風雲人物，1910年作為桂太郎內閣派遣的赴清觀光實業團團長，訪問中國各地，訪華期間與盛宣懷、文廷式、吳汝綸、端方等有過很深的交流。而盛宣懷、吳汝綸、端方亦是廉泉的舊友，大概是出於擁有共同好友的緣故，近藤與廉泉二人相識後迅速熟絡起來。廉泉在〈日記〉中寫道：「午後六點十分，赴男爵近藤廉平之約（中略），男爵號恬齋，為此邦實業家，雄于資，為人直方長者。與盛君杏菴（盛宣懷）友善，出示盛君贈便面，珍同拱璧。意欲割愛書畫數事，並殷殷維系，請緩歸期，故余贈詩首二語及之。十一點三十分，辭歸。」⁴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麥美德曾為廉泉介紹美國的博物館，想以重金收購「小萬柳堂」收藏，但是廉泉認為中日自古就有「同文之雅誼」，加上「欲辦公益」和援助親戚宮氏遺孤的想法⁴²⁾，驅使他選擇將藏品留在日本而不是美國。

7月9日，在收到廉泉書簡後第三天，大村西崖前往訪問廉泉，二人圍繞書畫價格之事進行了筆談，筆談中廉泉重申了出售藏品的初衷，廉泉東渡之後，雖然麥美德不遠千里前往上海看望吳芝瑛，並多次提及介紹紐約博物館收購書畫一事，但是廉吳夫婦仍然不為所動。為此，大村西崖在筆談中得知廉泉的想法後，曾感歎「不堪同情」、「欽仰」⁴³⁾。最終在大村西崖和正木直彥的奔走之下，廉泉將一部分藏品成功出售給了近藤廉平，他在〈日記〉中說：「恬齋（近藤廉平）購留書畫數事，願與我結為好友。我亦半送半賣，不與計較價值，於私無濟。」⁴⁴⁾除此之外，出售藏品一事亦可以在廉泉致內藤湖南的書簡中得到印證：「（前略）金箋硯田扇面及明人書畫扇面皆歸恬齋男爵（近藤廉平）矣。泉因男爵誠篤，君子殷殷維系又為吳摯老（吳汝綸）故人，故以極廉之

40) 前揭，〈大村西崖宛 廉泉書簡 翻刻〉，頁58-60。

41)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145。

42) 廉泉致大村西崖的書簡中，曾說：「宮氏之遺孤，經此世變，窮無以自存……麥君保存之盛心，至今三年，不知所以為報。泉與芝瑛往復商量，頗表同情。將此古物另求賢主人，使吾得價，以了未竟之志。除捐助鉅款於北京公理會教堂為協和女書院建築費外，悉以周卹宮氏之遺孤。泉只取少數，備兒女之學費，使得成立而已。」參見前揭，〈大村西崖宛 廉泉書簡 翻刻〉，頁58。

43) 前揭，〈廉泉と大村西崖の交友〉，頁42-45。

44) 前揭，〈南湖東游日記〉，頁155。

價讓之。頃有人砍得《黃雀雲林兩卷》及《澄清堂帖》，泉因砍與先生，一商尚未許之。」⁴⁵⁾ 結合〈日記〉「半送半賣」以及書簡「以極廉之價讓之」可以推測廉泉應該是以相當便宜的價格將藏品出售，至於究竟以多少錢賣給近藤尚且不明。1923年，日本審美書院出版了紀念近藤廉平的圖錄《飛鴻片影》，圖錄中刊登了近藤從廉泉處購得的王建章《柳溪春泛圖》與《漁樂圖》、文徵明《綠陰銷夏圖》等作品共計8幅⁴⁶⁾。

除了近藤廉平之外，廉泉還將部分藏品贈送或者出售給了實業家阿部房次郎（1868-1937），現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阿部房次郎寄贈的中國書畫中，可以確認有5件為廉泉的舊藏，分別是倪瓚《溪亭秋色圖》、王蒙《江皋煙嵐圖卷》、石濤《東坡時序詩意圖冊》、惲壽平《花卉冊》、高鳳翰《指畫冊》⁴⁷⁾。其中倪瓚《溪亭秋色圖》有漢學家長尾雨山（1864-1942）的題字和實業家山本悌二郎（1870-1937）書簡，此作品在成為阿部房次郎的收藏之前，為山本悌二郎的收藏⁴⁸⁾。據此推測，遞藏路徑為廉泉將其轉讓給山本，山本再轉讓給阿部房次郎。另外，王蒙《江皋煙嵐圖卷》中有廉泉的跋文如下：

乙卯東游，與阿部房次郎先生一見如舊交。先生與余同癖好古而鑑藏極精，庶幾所謂有真識，能真好者。因以此卷，聯稿紵之歡，比金蘭之契。昔趙子固、自題落水蘭亭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今當割愛投贈之際，雖為此卷慶得賢主人，而余心耿耿，黯黯如離其所親也。爰錄小詩一首奉塵吟定。荒荒萬劫如奔霆，選勝逢君眼倍青。千古賞音難再得，有人掩泣過柯亭。乙卯九月八日、南湖居士廉泉。

從廉跋中可知，廉泉1915年第二次東游之際與阿部房次郎相識，並一見如故。為紀念二人同為金石書畫鑑藏愛好者，因此廉泉將此幅作品「聯稿紵之歡，比金蘭之契。」割愛贈予阿部房次郎。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畫家富岡鐵齋（1837-1924）曾臨摹過石濤《東坡時序詩意圖冊》，作品名為《模石濤山水畫冊》，畫冊上有題款「大正三年寒露節，借覽真迹，匆卒臨寫」，此畫冊現藏於日本鐵齋美術館，從題款時間上看應當作於1914年10月，有研究認為此圖為富岡鐵齋從廉泉處借來臨摹⁴⁹⁾。然而，筆者查閱廉泉〈日記〉，並無富岡鐵齋的相關記載，加上廉泉首次東渡已於1914年8月5日回國，至此可以說明鐵齋不可能從廉泉處借來臨摹，至於究竟是從何處借來臨摹則有

45) 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1914年7月21日，日本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藏。

46) 上野鏐三郎編，《飛鴻片影》（東京：審美書院，1923），頁49-85。

47) 前掲，〈廉泉の日本における活動〉，頁83。

48) 森橋なつみ，〈大阪市立美術館収蔵の阿部コレクション〉，《阿部コレクションの諸相：文化的意義とその未來》（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19），頁76。

49) 李志綱，〈石濤《東坡時序詩意圖冊》與相關問題探析〉，《阿部コレクションの諸相：文化的意義とその未來》（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2019），頁97-114。

待考證。但至少可以推測1914年《東坡時序詩意圖冊》已經易主，而廉泉也成了此圖冊在中國時的最後收藏者。

上述倪瓚《溪亭秋色圖》曾被山本悌二郎收藏，然而筆者查閱山本悌二郎《澄懷堂書畫目錄》(12卷)(東京：文求堂，1932)之後，並未發現此圖收錄其中。據此推測，山本在1932年出版書畫藏品目錄之前，很可能就已經將此圖轉讓給了阿部房次郎。有趣的是，《澄懷堂書畫目錄》(卷四)王建章《臨松雪道人群驥圖》條目中，山本悌二郎說：「(前略) 故に其の眞蹟、宮氏(宮本昂、宮玉甫)に蔵せしもの甚た多し、而して出で、世に流傳せるも往往之有り。此の軸亦其の一なり、もと宮氏の姻戚廉南湖の小萬柳堂に蔵たりしが、南湖東遊の時、携へ来りて竟に吾齋に入れり。」⁵⁰⁾(筆者譯：故其真蹟，宮氏兄弟所藏甚多，且往往有流出世間。此軸亦其一，原藏宮氏姻親廉南湖「小萬柳堂」，南湖東游之時將其攜帶前來，最終進入吾「澄懷堂」)從山本的解說中可知，廉泉攜王建章《臨松雪道人群驥圖》東渡日本展覽，並將其轉讓給了山本悌二郎，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以上即為「小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複製與鑒藏情況。廉泉的東渡，一方面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書畫的在日本的複製與傳播，另一方面他的藏品受到了日本學者、書畫家等文人墨客的歡迎，為近代日本的中國美術鑒賞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基礎。

四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以廉泉致內藤湖南書簡和〈南湖東游日記〉為中心，透過廉泉及其「小萬柳堂」收藏、前兩次東渡日本出版和介紹中國書畫的活動軌跡、以及與日本文藝界的互動情況等，考察了民國初期「小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流轉與鑒藏狀況。廉泉攜藏品東渡，一時震驚了日本文藝界，引來無數政要和名流與之爭相交友，這可以稱得上是20世紀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罕見的「蜜月期」。

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繪畫的發展受「國家主義」的影響過分提倡「日本畫」，從而導致日本美術中的「中國趣味」以及文人趣味的「文人畫」日漸衰落。到了19世紀末，日本國內保守派反對過分歐化主義，於是開始提倡國粹主義，尋求文化認同⁵¹⁾。另一方面，在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文物出現了大規模的流出，除歐美之外，流失海外的另一個重鎮就是日本，繼而引發了「日本主義」向「中國正統美術」的轉變⁵²⁾。因此，到了日本大正時期，為了抵抗西方抽象藝術的

50) 山本悌二郎，《澄懷堂書畫目錄》(卷四)(東京：文求堂，1932)，頁91-92。

51)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442。

52) 前掲，《近代日本の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頁250-256。



圖9 神戶扇面館及南湖居士之寫真 內藤文庫藏



圖10 南湖扇面館陳列場內景 內藤文庫藏

衝擊，在明治初期被擠到日本藝術邊緣的「文人畫」被賦予了新生，成為了「現代東方藝術」⁵³⁾。

在上述時代背景之下，廉泉攜「小萬柳堂」藏品東渡，受到了日本學界的歡迎。在大村西崖、內藤湖南等人的推動之下，廉泉的藏品得以在日本展示、出版、傳播，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近代日本學者尋求文化認同、復興「文人畫」的「精神食糧」，客觀上也促進了日本「藝術漢學」⁵⁴⁾的發展。廉泉在上述兩次（1914、1915）東渡日本返回中國之後，緊接著又四次（1916、1917、1919、1927）東渡扶桑。從第二次訪日開始，廉泉在神戶設立「南湖扇面美術館」（圖9），重點出版和介紹書畫扇面（圖10）。後來廉泉委託大村西崖斡旋交涉，出售了《書畫扇存》中的扇面藏品。現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明清書畫扇面」843幅，其中有68幅惲壽平的作品於1935年12月被日本指定為「重要美術品」。縱觀「小萬柳堂」書畫在日本的流轉與鑒藏，可以說，它成為了日本學者重新認識中國藝術史和編撰出版物的素材之一。廉泉訪日舉辦展覽和出版書畫的事跡，被載入《東京藝術大學百年史·東京美術學校篇》⁵⁵⁾之中，它不僅為日本的中國藝術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史料基礎，而且對近代中日美術交涉史研究也有著非凡的意義。

【付記】本文為日本科学協會・笹川科学研究助成「王一亭と近代日本美術界：大正・昭和前期の「興亜美術」運動に関する研究」（研究代表者：邱吉 研究番号2020-1017）之部份研究成果。

53) (美) 阮園 (Aida Yuan Wong), A New Life for Literati Pain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astern Art and Modernity, A Transcultural Narrative?, *Artibus Asiae* 60. 2 (2000): pp297-326.

54) 「藝術漢學」即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日本早期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始於內藤湖南、長尾雨山、大村西崖、澆精一等學者的推動。參見朱其，〈海外中國藝術史研究概述〉，《中國美術報》，2019年6月24日第013版。

55) 東京藝術大學百年史委員會編，《東京藝術大學百年史·東京美術學校篇》第二卷（東京：ぎょうせい，1992），頁567、頁595-596。

